

从“五 W”模式看《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①

唐建阳

(湖南工业大学 研究生处,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以拉斯韦尔的“五 W”模式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传播者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很大,传播目的也大相径庭;二是传播内容各有侧重,传播信息有对有错;三是传播渠道单一,广度有限;四是传播对象各有定位,针对性强;五是总体传播效果显著。

关键词:“五 W”模式;《共产党宣言》;中国;早期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1)01-0087-06

Early Sprea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hina Based on the “Five W” Model

TANG Jianyang

(Postgraduate Affairs Offic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Abstract: Taking Lasswell's “five W” model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our analysis, we can get the early sprea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hina as below: Firstly,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of class status and political status among the spreading groups with different spreading purposes. Secondly, the spreading content are also different and not all of them are correct. Thirdly, the spreading ways and range are limited. Fourthly, the spreading objects are various at all levels. Fifthly, the spreading effect is remarkable as a whole.

Key words: “Five W” model;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hina; early spreading

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并且继续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同样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并且继续发挥着重要而伟大的作用。回顾《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和特点,有利于我们坚定对《宣言》的信念。

一 传播者成分复杂,目的各异

在传播学中,传播者是相对于受传者而言的。从广义上理解,凡凭借生理或一定的媒介手段传递信息的,均可称为传播者。按照这个观点,早期《共

产党宣言》传播者的队伍十分壮观,其阶级成分非常复杂,传播目的大相径庭,传播环境也有所差异。

(一) 外国传教士

《共产党宣言》思想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为1899年2月。从1899年2月到4月,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由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文章首次提到“马克思”、“安民新会”(即“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1]李提摩太1870年来华,1891年继任广学会总干事,在他的策划下,广学会出版了许多传播西方文化的书刊,《万国公报》为影响最大

^① 收稿日期:2010-09-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09YJA710020);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资助(CX0803)

作者简介:唐建阳(1984-),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工业大学法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的刊物。当然,李提摩太也决非要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将其作为众多西方学说之一介绍到中国。

(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第一个为寻求救国真理而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是孙中山。1896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流亡到伦敦并居住近一年。这期间,他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革命。在这里,他第一次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姓名并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宣言》有一定传播。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二卷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其中引用了对《共产党宣言》思想的概括。福井准造写作,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书中多处提到《共产党宣言》,并称之为“一大雄篇”等。^[2]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生涯及《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宋教仁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介绍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情况,并指出《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是“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赞同《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社会主义,而不赞同无政府主义。

(三)无政府主义派代表人物

刘师培妻子何震在东京创办无政府主义派的杂志。1907年10月30日刊出《天义报》的“新书预告”中,有“《共和党宣言》”即《共产党宣言》;后来又摘录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关于家庭、婚姻制度的论述;^[3]1908年1月15日,第15卷上刊载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并再次登出《共产党宣言》等新书预告,以后又多次刊登。到辛亥革命前后,《共产党宣言》还有一些点滴介绍,但高潮已过。纵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是中国大动荡的时代,为了找到救亡图存的真理,先进的中国人做了各种尝试和理论选择。《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被当作西方哲学的一支传入,而传播者多是资产阶级先锋战士。这些人多在海外留学生中间及上海一带,多用文言文,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还相当肤浅。

(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我国五四运动的掀起,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我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武器,《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也进入到一个崭新

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是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1918年底,李大钊在庆祝欧战胜利的演讲中就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实际上,李大钊研究和宣传《共产党宣言》还要早些。1917年冬,他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还与北京大学教授高一函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团体。1918年2月,李大钊又与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该刊第16号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李大钊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连载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文。文章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同年11月,北京《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刊载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李泽彰从英国译出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译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920年3月,在李大钊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学习和研究这些著作,研究会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法文、德文三个翻译小组,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组织。在五四运动前后,还有许多介绍和讨论《共产党宣言》的文章。这一时期,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已经意识到应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来运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

可见,在五四运动时期,《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内容在传播。传播以北京为中心,涉及到国内广大地区。因此,这一时期《共产党宣言》思想的传播已经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

二 传播内容各有侧重,对错掺杂

从传播内容来看,不同身份的传播者各有取舍,各有侧重,且对错掺杂,具有浓厚的主观意识。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对《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仅仅只是提及,影响不大,故在此不做分析。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不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而是由西方传教士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过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为了向中国人民兜售西方的宗教教义,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是为了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然而就在他们兜售和鼓吹的过程中,却先后不自觉地、零星地、甚至是歪曲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介绍给了中国

人民。

在中国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之处在于,是用一种赞赏的态度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

1896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时,就开始了探讨社会主义理论,并知道了马克思。宋庆龄回忆说:那时“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4]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

虽然此时的孙中山并不十分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有了朦胧的认识,因而他自信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诩,并怀着虔诚和热情四处寻找社会革命党。1905年初,孙中山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在会见中,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他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是要避免其种种弊病”,“我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5]为此,孙中山还请求第二国际书记处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尽管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还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大量摘译,较系统地进行了介绍。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宋教仁等人都在《民报》上著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摘译《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的章节内容。

1906年1月,朱执信以笔名“蜚伸”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而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评述。他说:“马尔克(即马克思)起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第一国际)奉以为金科玉律”,“德意志之劳动者亦感于马尔克之说,起而与富豪抗。”^[6]又说:“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

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他为此还专门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几段内容介绍其要点。如第一章开头译文是:“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今译“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结束语译文是:“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在同年6月出版的《民报》第五号上,宋教仁也以翠斋的笔名译著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向民众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其曰:“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7]他所译的比朱执信译的更贴切于原文。叶夏声也以梦蛛生为笔名,在《民报》的第七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也在文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

1908年1月,在同盟会员刘师培、何震等人创办的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天义报》第十五号上,刊登了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一部分,并加编者按语说:“案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随后,又在3月出版的《天义报》第十六至十九期合刊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上述《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的摘译主要来自日文,而日文《共产党宣言》全文本,则1904年首刊于幸德秋水主编的《平民新闻》上。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上,出现不少曲解和误解,但毕竟给国内的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向海外积极寻求革命理论,一方面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运用其学说观察、剖析国家命运,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又在其自身学习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19年4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十

六期上发表了以“舍”署名的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文章在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是 Marx 和 Engels 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在介绍《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的基本内容时,作者明确指出:“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 Democracy 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关系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文章还着重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政纲,较之《民报》的译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该文对《共产党宣言》的介绍仍有许多不准确之处,却突出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该文的发表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对即将来临的五四运动有一定的促进和影响。

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也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认为“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不仅如此,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时,还专门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内容。而他在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时,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登载渊泉所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一文。该文从《共产党宣言》产生谈起,并对《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进行了较准确的翻译:“共产党以隐蔽主义、政见为卑劣的行为。所以我们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们能够推倒现时一切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他们权力阶级在共产革命的面前是要发抖的。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懈!”

在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国民党人也由过去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转为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方面。当时由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

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便是他们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据统计,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设》杂志就刊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20余篇,成为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比较突出的刊物之一。而《星期评论》则是与《新青年》齐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觉悟》副刊也是如此。自1919年6月以后的3年内,刊载了马列主义原著及介绍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达50余篇,其数量超过了《新青年》。由此可见这3个刊物在中国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此时在国内涉及《共产党宣言》的中文摘译比较多,但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全译本。

1920年春,陈望道由于在浙江第一师范受到守旧派的攻击,便离开此地,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因受约《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的委托,开始潜心研究新思潮,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思想颇为激进,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份量,打算译成中文。可阅读之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比如该著作的第一句话(今译“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要想贴切地译成中文就不容易。此后,当他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便四处物色合适的译者翻译《共产党宣言》,准备在该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向他举荐杭州的陈望道。于是,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据云,周恩来在50年代曾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是据日文本译,同时参考了英文本)。

陈望道回到家乡后,在一间柴房里,开始翻译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经年失修,破烂不堪,而山区早春的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手足发麻,可他硬是只凭借着柴房里的一块铺板、两条凳、一盏油灯以及老母亲送来的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终于在4月间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 传播渠道媒介单一,广度有限

拉斯韦尔所说的传播渠道,特指传播媒介,即传播过程赖以实现的中介,是承载并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而这种传播媒介在传播学中更加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因为大众传播媒介能促进社会向新的风俗行为、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正如麦克卢恩所说:“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为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他甚至认为,使人们生活真正发生变化的是那个时代的主导媒介,而不是其内容。“它们的影响如此之广,涉及个人、政治、经济、美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及社会,无人能避免与之接触,或免受其影响和改造。”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众传媒在早期《共产党宣言》传播过程的杰出地位和作用。在早期《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过程中,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报纸和杂志。

(一)辛亥革命时期报刊

早期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主要靠日记来向国人传递这些信息。当时值得一提的刊物是《西国近事汇编》,该刊由洋务派在上海创办,英国人傅兰雅任主编,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之一。

1896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流亡到伦敦并居住近一年。这期间,他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革命。在这里,他第一次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在孙中山的影响下,马君武的《译书汇编》、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宋教仁的《民报》都宣传过《共产党宣言》。

1907年6月10日,中国无政府主义派别主办的《天义报》在日本东京创刊,该刊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也进行了正面介绍。此外,无政府主义派别主办的《衡报》、《新世纪》等刊物,均不同程度地对《共产党宣言》进行宣传。

1911年11月成立的中国社会党更是以宣传社会主义自居,他们主办了《社会党月刊》、《社会党日刊》、《人道》、《社会星》、《新世界》等刊物,刊载了部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

(二)五四运动时期报刊

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宣传《共产党宣言》的进

步报刊有多种,其中,报纸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闻》等为代表,杂志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建设》等为代表。《新青年》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刊物。此外,《国民》、《建设》等杂志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如《觉悟》在1919~1925年共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约50篇;《国民》也在第二卷发表了由李泽彰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本打算分作两期将全部译文发表,后因故只刊登了一半。

(三)中共建党时期报刊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立了《共产党》月刊。该刊大量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进展,登载各国党领导的工人斗争的材料。其他共产主义小组积极配合上海组的行动,利用已有或自己创办的公开报刊,如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等。此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办了大量的通俗刊物,如《劳动界》周刊、《劳动者》周刊、《劳动音》周刊以及《上海伙友》、《机器工人》、《工人周刊》等杂志。这些刊物用浅显的语言向工人阐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向工人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向工人宣传团结战斗的意义和争取自身解放必须遵循的途径。

综上所述,报刊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唯一大众媒介。尽管报刊具有容量大、技术设备要求低、资金少和阅读不受时空限制的优点,但这种媒介受到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制约,因为必须经过编码和解码过程才能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而我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盲的比例大,且集中在广大农村,这就严重制约了《共产党宣言》传播的范围。

四 传播对象各有定位,针对性强

传播对象指的是受众,即接收媒介传播的信息并做出反应的人。受众是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传播效果的体现者。不同的传播者在传播某一信息时,总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传播对象。在早期《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过程中,不同的传播者根据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传播意图,确定了自己的传播对象。

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对《共产党宣言》的部

分理论比较认可,但是他们始终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选择的受众是与他们有同一身份和地位的人,希望这一部分人能够及早警醒,防止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生,从而更好地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外国传教士,他们把传播对象锁定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身上,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教义。

资产阶级改良派传播《共产党宣言》的目的是迫使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因此,他们选择的传播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传播对象的定位:一是赞同改良观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二是清王朝的当权者。他们希望有一批知识分子来附和抵制马克思主义,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同时也希望当权者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实行立宪政治,结果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盛行,从而彻底颠覆当权者的统治。

综上所述,在早期《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上,所有传播者把传播对象都定位为各自阶级或阶层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共产党宣言》传播者是以拯救中国为目标,因此,他们的传播对象不仅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包括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办不到的,为了达到其传播目的,他不仅了解广大人民群众,而且给他们以足够的尊重,不仅如此,早期的传播者还开始注意农村工作。^[8]

五 传播效果总体显著,影响深远

关于传播效果,一般理解为受传播者接受信息后,在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但随着传播学的发展,这一传播效果的界定已有了很大的扩展,即把信息共享、兴趣养成、知识承接、情绪反应、审美愉悦、认同一致、态度转变和行为改变等都纳入传播效果之列。传播效果即是传播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广义上讲,传播行为所引起的客观结果,包括对他人和周围社会实际发生作用的一切影响和后果。狭义上讲,是传播者的某种行为实现其意图或目标的程度。其含义为:第一,它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

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第二,它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显在的还是潜隐的。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它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宣告了共产主义者的观点、目的和意图。从它问世后至今已翻译成200种文字,再版1000多次,深深地影响了人类和世界。它的影响之大、传播范围之广、生命力和真理性之强,是无与伦比的。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宣言》的内容始终是开放性的。《宣言》的思想与中国的实际发生过三次重大结合:第一次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表现为《宣言》的价值观与救亡图存运动的结合;第二次发生在建党以后的民主革命时期,表现为《宣言》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第三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表现为《宣言》的生产力观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宣言》为中国的前途指明了方向,为中国造就了大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李提摩太,蔡尔康.大同学[G].万国公报:第121册(影印).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11-13.
- [2] 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M].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线装本,1903:13.
- [3] 佚名.新书预告[N].天义报.1907-10-30(15).
- [4] 宋庆龄.宋庆龄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70-537.
- [5] 郝盛潮,陈旭麓,王耿雄.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364.
- [6] 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J].民报,1906(2).
- [7] 宋教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J].民报,1906(5).
- [8] 李军林.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责任编辑:卫 华